

1962—1965 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先行探索^{*}

刘正妙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1962—1965 年, 围绕如何调整和搞好国民经济, 在全面深入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过程中,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先行探索, 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战略目标和步骤、根本任务、基本方针、动力和手段等提出了若干重要观点,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和物质准备, 也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迪。

[关键词] 毛泽东; 中央领导集体; 经济建设; 探索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 (2016) 08-0042-006

DOI:10.16580/j.sxlljydk.2016.08.011

1962—1966 年是国民经济深入调整时期。围绕如何调整和搞好国民经济,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过程中,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战略目标和步骤、根本任务、基本方针、动力和手段等提出了若干重要观点, 有效地指导了经济建设实践, 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创提供了理论和物质准备, 也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出发点: 立足国情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从中国现实国情和国力出发。全面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伊始, 毛泽东便深刻地提出“第二次结合”这一命题。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 1961 年调查研究之风蔚然兴起, 领导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了解

国情。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再次强调: 为了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 并且同今后的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 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 从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建设的客观规律。^{[1](P828-829)}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立足“一穷二白”的国情, 放慢速度, 降减建设指标, 提高质量。搞经济建设“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不要从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 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搞多了不行, 就是有钱, 还是要打歼灭战。……安排要少些, 多做少说, 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 但是没有做到。”^{[2](P348)}

“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 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 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 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 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2](P501)}毛泽东的这些观点, 也是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在管理国民经济具体事务中赞同和长期坚持的。1962 年, 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

^{*}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项目批准号: 11JZD00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1956—1966)” (项目批准号: 13JD21) 和湖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中公民参与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 2014SK3282) 的阶段性成果。

“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3](P193)}

“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较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3](P206)}

4月，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发言，进一步阐述了陈云的观点。他说，解决问题的方针要按照陈云讲的“争取快、准备慢”，还要增加：“争取好，准备差一点”；“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对情况了解了，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4](P1480)} 1963年，邓小平在讲到工业问题时也指出：“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摸清了现在的基础，从现实出发，总结本国的经验，吸取外国的经验，工业发展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5](P334)}“要老老实实，有多少就是多少。”^{[6](P155)}以上论述表明，当时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需要我们快速地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群众希望过上好生活的愿望，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不考虑这一实际，脱离国情，建设规模过大、建设指标过高、速度过快则会欲速而不达，甚至损害群众利益，导致执政合法性资源流失。

这一经验为新时期党的领导人所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深知我国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国情，因而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大战略问题时，总是以此为基础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从而提出适合国情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策略。他在讲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时就强调，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50多个民族、13亿多人口，治理很不容易，既要登高望远，又要脚踏实地。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现代化两步走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一个让全国人民感到鼓舞的历史性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根据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具体描述：“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7](P439)}关于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中央提出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利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起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四个现代化”和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奋斗目标、“两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要“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8](P1433)}“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P1437)}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目标，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构想。1956年，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报告时再次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9](P184)}这一建议被八大所接受。八大决议明确提出：“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0](P315-316)}的蓝图和“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7](P232)}的战略步骤。在这里，“四个现代化”第一次被写进党章。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1](P268)}1959年，周恩来在一个报告中提出建立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问题：“建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这包括工业、农业、财政、贸易、文教、科学、国防等各方面。”^{[12](P403)}“不仅表现在生产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基础上”。^{[12](P405)}这一提法，较之以前的“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内容更为丰富，外延更为宽广。196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都强调，除了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要加上国防的现代化。“第一阶段要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第二阶段要实现得更好。”^{[13](P310)}

1963年1月,周恩来把“四化”的提法改为:“我们要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14](P447)}9月,毛泽东讲到:“在三年过渡阶段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15](P347)}至此,“四化”“两步走”的建设思路基本形成。

“四个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的提出,经历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入探索,通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最终被确定下来。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追求,鼓舞、凝聚和团结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它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准备。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 发展生产力

三年自然困难时期使人们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不能盲目地迷信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对此,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1961年1月,他明确提出:“如何搞社会主义主要看两条:一是群众满意。二是发展生产力。群众满意、支持是判断好坏的标准。”^{[16](P1615)}1962年3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讲到恢复农业生产是靠个人还是集体时,邓小平说:“原则是哪种办法在哪些地方见效快,就用哪种办法。不要拘泥于形式,不要担心个人多了,集体少了。”^{[16](P1697)}

农村地区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促使中央领导人特别重视发展农村生产力。在思考如何打破“一大二公”的农村公社建设模式,探寻较为灵活的建设途径时,一些中央领导人认为“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可以促进农村落后生产力的发展。1962年5月,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17](P1229)}对此,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支持。刘少奇说,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发展集体经济也好,包产到户也好,无非是看哪种形势更切合当

地的实际情况,哪种形势更能充分发挥社员的积极性”。^{[18](P120)}邓小平表示:“现在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6](P146)}几天之后,他更为坚定地提出,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5](P323)}以上观点表明,中央领导人认识到搞建设不能使生产关系形态固化、僵化,包产到户之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价值,在经济遭到重大破坏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不应盲目否定。这些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打破了“大跃进”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主义认识,为中国特色农业经济体制建设提供了经验。

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搞科学技术。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7](P412)}9月,毛泽东在审阅一个报告时强调,近代以来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是抵抗外来侵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不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态,不大力发展生产力,就还会挨打。^{[2](P259)}12月,他再次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以前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做这事情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变革生产关系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P295)}对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周恩来认为要做到十六个字: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和迎头赶上。毛泽东认为,中国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需要打破常规,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国家。^{[2](P447)}

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坚持综合平衡

关于综合平衡的重要性。“在计划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一件大事情,没有综合平衡就没有符合实际的计划。”^{[19](P209)}“三面红旗”大试验的挫折证明,

只有建立在综合平衡之上的计划才是既积极又可靠的计划,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此相反,破坏平衡,胡乱折腾,只能使人民群众利益受损。“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3](P211)}

关于综合平衡的内涵。陈云认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有计划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一个部件不行,即使其他东西都是好的,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一定搞不好。^{[3](P211)}薄一波也指出:“什么叫综合平衡?讲透了,可以把计划工作全部包括在里面,就是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20](P237)}

关于实施综合平衡的原则。陈云强调应认清清楚两点:一是什么时候开始搞综合平衡?有些人认为现在不能综合平衡,缺少条件。他们主张在制定几个远景指标的基础上,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方案。陈云对此明确反对。他说:“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二是从什么“线”出发搞综合平衡?按长线搞平衡,常常导致无法平衡——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积压,造成浪费。陈云认为,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3](P210-212)}对此,周恩来深表赞同。

关于综合平衡的方法。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关键是要处理好农、轻、重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重工业是我国建设重点,必须优先发展,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他同党员干部谈道:“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19](P78)}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农、轻、重”这一概念。不过,“农、轻、重”的国民经济发展方略未被写进庐山会议的相关决议之中。1962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搞经济建设成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的共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不能离开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这一基础,搞生

产的目的,必须在安排好两大部类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时候,过度地追求积累而忽视消费,最终只会破坏生产力。

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 改革经济体制

一般而言,国民经济的调整必然要反思和部分否定之前的经济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就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试办托拉斯、实行两种劳动教育制度等进行了探索。

“城镇减人和精简职工,既是调整城乡关系、调整工业与农业生产所必需,更是克服当前财经困难最有效的办法。”^{[21](P257)}全国现有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不仅在今天是过多的,就是按照今后几年内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可能达到的程度来衡量,城镇人口也大大超过了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和其他产品的负担能力。^{[21](P462)}减少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钞票投放和粮食供应,也影响生产的调整,各方面都受影响。”^{[5](P318)}要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刘少奇提出,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进行,不能慌慌张张一股风。要保障城市不闹事,不能出事故。如果我们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负起责任,与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群众是可以说通的,工作是可以做好的。^{[22](P446-447)}邓小平也强调:“精简对外强调一视同仁,但处理不要太急,逐步搞出路。”^{[6](P215-216)}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有力、措施得当、群众支持,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城市发展取得瞩目成就,但也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虚高、管理粗放、应急迟缓等问题;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等公共资源奇缺,不少村落逐步衰落和消失。对此,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理念,着力治理城乡人口布局和发展结构问题,发展和创新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思想。

托拉斯是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高度重视的资源配置方式,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应懂得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捏造出来的,而是要靠共产党人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所制

造的东西。^{[23](P536)}这一观点对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机器设备使用的比较充分,速度也比较快。^{[24](P203)}1963年,办托拉斯被提上议事日程。1964年,中央工交部门和部分省市尝试创办托拉斯。在办托拉斯的过程中,邓小平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现在搞的托拉斯,有些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而是用行政方法管理。托拉斯就是按行业去管理,只有个别的计划部门,有一两个司管理综合的东西。”“通过经济关系搞协作,有利于专业化、系列化,能更快发展新技术,发展生产。托拉斯不要搞大而全。”^{[6](P215-216)}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试办托拉斯,逐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使国民经济更有计划、更有组织,是远见卓识之举。期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根源不在托拉斯企业本身,而在于外部的因素。试办托拉斯取得了应有成绩,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

所谓两种劳动制度指在工厂、机关实行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的同时,实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前者是主要的。^{[25](P909)}此外,劳动制度还要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固定工制度与临时工制度同时并存。^{[26](P598)}所谓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教育制度,前者为主,后者为辅。^{[25](P909)}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可以减轻农民和国家负担,又能满足青少年就学的要求,有利于普及教育;^{[26](P598)}可以在有效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率的同时,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缩小城乡差别、工农的差别;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21](P466-469)}如何推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具体规划,先搞试验,不要一下子铺开”;^{[26](P596)}要做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定型和体系建设工作,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要健全管理体制,加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要组成教育委员会,成立第二教育厅。实行两种劳动、两种教育制度,符合我国国情,为我们今天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民教育,推行中国特色劳动就业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 发展商品经济

发展农业商品生产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内容。1962—1965年,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以加强农业战线、大力发展粮食商品生产为首要任务,但也强调要搞好农村副业,抓好经济作物。1962年5月,朱德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对家庭副业限制太死,要解除禁令。在农村,农民除生产米粮外,还要抓副业生产。正业和副业两不误,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种茶、养蚕、养家畜等家庭副业来解决。^{[27](P1836-1837)}1963年9月,周恩来讲:“从全国看,粮棉是增产的,其他经济作物也是上升的,当然上升速度慢些。从明年起,要狠抓其他经济作物,配合粮食、棉花一起上去。”^{[28](P578)}1964年4月,毛泽东同江华等谈话时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2](P344)}在他看来,保留自留地,能够给农民一定的自主权,让农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将剩余的物产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丰富商品种类,改善群众生活。1965年,刘少奇、邓小平还提出,要把副业生产搞起来,副业生产搞不起来,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26](P626)}农场首先要有饭吃,自己搞粮食,然后再搞其他的东西。搞经济作物,价值很大。^{[16](P1885)}

扩大商品流通是促进商品生产的重要环节。如果商品流通不畅,政府对流通领域管得过死,限制过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29]1962年1月,刘少奇明确提出,“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 and 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22](P365)}5月,他对下放干部讲话时,批评了那种各自为营、作茧自缚、互不合作、阻碍商品流通的行径。他说,现在有些地方的市场跟全国市场相矛盾,抵触别的地方的产物,这是不允许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没有统一的市场就不能发展。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为地设置关卡,制造障碍、壁垒的行为必须纠正。^{[22](P460)}在思考商品流通问题时,刘少奇认为生产资料的管理和流通是重点。在他看来,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物资供应中许多问题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有关。“物资部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是管理生产资料

的商业部”；“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从1962年3月至1965年，他先后七次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物资供应体制改革问题，许多内容涉及生产资料流通。经过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我国物资体制改革取得可喜成绩，初步形成了生产资料市场，丰富了商品种类，畅通了流通渠道。

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搞好集市贸易是推进商品流通的有效手段。^[30]中共中央认为，集市贸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如果认为，对于集市贸易，可以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这就是不对的。虽然集市贸易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能促进农副业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投机倒把的消极作用。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经济措施和正确的行政办法，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它的消极作用。^{[21](P500)}

概括地说，1962—1965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艰难地寻找问题，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提出了以上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虽然，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三面红旗”的错误，以上观点在当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有些认识甚至出现了反复，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中的宝贵经验和正确认识得以被继承、创新和发展，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直接来源；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得以总结和反思，为改革开放找到突破口，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供借鉴。该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既存在联系又存在区别，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飞跃。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到邓小平时代终于找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3]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周恩来传，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5]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 [7] 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3] 纪念周恩来诞辰九十五周年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14]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6]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17] 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8]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2] 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3]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5] 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6]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27] 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2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9] 谭献民.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路线[J].湖湘论坛，2014，（3）.
- [30] 张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性解读[J].毛泽东研究，2015，（6）.

责任编辑：张楠